

論唐初文学思想発展的特点

張, 少康

<https://doi.org/10.15017/2332583>

出版情報 : 文學研究. 88, pp.35-50, 1991-03-30. 九州大学文学部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論唐初文學思想發展的特點

張 少 康

唐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最为繁榮昌盛的時代。唐王朝是在隋末農民大起義和徹底摧毀六朝門閥世族統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特別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政治上比較清明，經濟上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從文化思想方面說，初唐的特點是要改變齊梁遺風，建立一種與唐王朝的政治、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新的文化思想。唐初文學思想的主流正是這種新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一般的文學史與批評史著作，都認為唐初新文學思想以及在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是在反齊梁文風中發展起來的。但是，這種說法其實是過於籠統、缺少分析，而不完全確切的。唐初新文學思想不僅是在充分繼承齊梁文學的優秀成果，批評齊梁文學的錯誤傾向中發展起來的，而且是在反對齊梁文學全盤否定的錯誤文藝思潮中逐漸形成的。本文擬對此作一些具體深入的分析與論証。

一

唐初文學思想的發展、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正確地對待齊梁文學。從隋代到唐初的許多思想家和文學家對齊

梁文學的評價是很不相同的。為了科學地評價唐初對齊梁文學的各種不同態度，首先要對齊梁文學的功過作出一個合乎實際的歷史評價。過去人們對唐初文學思想發展之所以不能給以正確的分析，其原因即在於對齊梁文學的簡單否定，認為齊梁文學就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淫靡華艷文學。從文學發展的實際來看，六朝文學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成就和貢獻是很大的。齊梁文學是六朝文學發展中的重要階段，它從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兩方面總結了自魏晉以來將近四百年中文學藝術發展中的新成果和新經驗，初步形成了近體詩的格式和雛形，使中國古代文學的許多藝術表現技巧漸趨成熟。當然，齊梁文學也有許多明顯的不良傾向，但絕不能對它作簡單的否定。重視文學的「緣情」本質，講究藝術形式的華麗，注意運用多樣化的表現方法，細致地探討詩歌的格律，這些毫無疑問對文學發展是起了積極促進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齊梁文學的發展，也就不會有唐詩的繁榮。齊梁文學對文學的健康發展不利的錯誤傾向，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相當一部分作家中有比較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而不注意內容充實的缺點。有些作品思想內容貧乏、不健康、情調低下、風格柔靡。第二、在藝術上偏重詞藻、典故、聲律等具體技巧，而對審美意象的整體塑造方面較為忽視。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曾經概括地指出：「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這裡，「意興」正是指詩的審美意象而言的。唐詩之所以不可企及，正是由於它「尚意興而理在其中」，這是符合藝術審美規律的一種追求。嚴羽批評「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非常精確而切中要害地指出了齊梁文學上述兩方面的缺點。但是，近人研究齊梁文學的弊病，往往只看到上述第一方面的問題，而很少重視上述第二方面的問題。其實，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的重要意義之一，正是在對當時文學發展中這兩方面的缺點，都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們所提倡的「風骨」或「風力」，正是為了克服這兩方面的弊病。既講究文學作品的深刻社會內容，要求它表現真摯而強烈的感情，又十分重視藝術意象的生動、形象，要求塑造出鮮明的完整的藝術意象。所以劉勰特別強調要正確對待「風骨」與「繁采」的關係，認為應當以「風骨」為主，「繁采」為輔，「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建既實，輝光

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文心雕龍·風骨) 只有「藻耀而高翔」、方是「文筆之鳴鳳」。(同上) 鍾嶸在詩品序中提倡「建安風力」、認為優秀的詩歌應似曹植的作品那樣、既要「情兼雅怨」、又要「體被文質」。他主張文學創作應當是有感而發的產物、「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種種生動豐富的社會生活、感蕩了作家的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而不應當只是寫些內容空虛、貧乏、無病呻吟之作。從藝術上看、鍾嶸指出詩歌之美即在其「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上、也就是說詩歌藝術的關鍵是要創造審美意象、象文言詩那樣「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就喪失了詩歌作為藝術的美學價值、但是、片面追求瑣碎的格律、大量堆砌枯燥的典故、喪失「自然英旨」、也同樣不能創造出含蓄雋永的有「滋味」的審美意象。只有對齊梁文學的功過作出合乎實際的科學評價、才有可能正確地認識唐初文學思想發展的特點。

從隋到唐初反齊梁文風的過程中、實際上存在着兩種很不相同的傾向。一種是對齊梁乃至整個六朝文學持根本否定的態度、甚至把產生華靡淫麗文風的根源一直追溯到以屈原作品為主的楚辭、這一派可以李諤、王通、王勃等為主要代表。另一種則是在批評齊梁文風過於追求形式華艷的同時、充分肯定其成就與積極影響、主張對齊梁文風採取具體分析的態度。這一派可以唐初的史學家魏徵、令狐德棻等為代表。對唐代文學思想發展來說、前一種傾向顯然是不利的、它只能使唐代文學由反齊梁文風而走上另一個極端、重新成為經學的附庸。而後一種傾向才是唐代文學健康發展的正路。因此、唐初文學思想的發展、在批評齊梁文風錯誤的同時、還必須反對對齊梁文風的簡單否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後一方面更為艱巨的。因為從隋到唐初、雖然創作上還是沿襲齊梁的舊路、剛建清新、內容充實的作品還不多、但是、從文學思想上看、齊梁文風已處於被否定的地位、而對李諤、王通、王勃等人的錯誤與片面性、却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如果唐代文學按李諤、王通、王勃等所主張的方向發展下去、必然要走進一條更為狹窄的死胡同。有些文學史或批評史著作不僅沒有看到李諤、王通、王勃等人和唐初史學家在文學思想上的原則區別、而且籠統地把他們都看作是唐代文學和文學思想發展的先驅、這是完全錯誤的。為此、我們必須對這種混淆歷史真相的狀況予以澄清。

隋代統一中國之後，比較側重在繼承和發揚北方的文化思想，從儒家的政教觀點出發，提倡質樸崇實，大力反對南方的淫麗浮華。當時隋文帝曾十分強調要「屏出輕浮，遏止華偽」、開皇四年下詔曰：「公私文翰，並宜實錄。」（見隋書·李諤傳）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遂有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的提出。李諤主張一切文章（指廣義的文章，亦包括文學在內），都要以「教化」為本，認為「詩、書、禮、樂」乃「道義之門」、學習六經以為文，可以實現「家復孝慈，人知禮義」的目的。為此，他提出「上書獻賦、制誅獻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証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李諤把文學作品和一般的公文、應用文、政論文等理論文章等同起來，抹煞了文學作品作為藝術不同於這些一般文章的特點，否定了文學的審美特性，因此，他對魏晉以後講究藝術美的文學大加指責。他在上書中說：

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李諤的這一段論述曾經被許多文學史、批評史的研究者所肯定，作為批評六朝形式主義文學的經典性論斷，其實是十分錯誤的。李諤在這裡雖然也指出了六朝文學中片面追求形式美，忽視文學作品思想內容的缺點，但是，從總的方面來看，他的持論極端偏激，不能正確反映六朝文學發展的實際。首先，他以儒家教化為「正道」，不僅無視建安、正始等時期文學作品的進步社會內容，而且置陶淵明、鮑照等許多優秀詩人於不顧，對六朝文學作了全面的否定評價，這顯然是極不公允的。六朝文學從曹氏父子到嵇康、阮籍、左思、劉琨、到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沈約、庾信等著名詩人，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重要特點之一，正是對儒家「風教」的突破，從而自由地、不受拘束地唱出了自己的心聲、

表達了真實的感情、使文學創作得到健康的發展。否定了他們實際上也就是否定了文學發展的歷史。其次，李諤在這段論述中嚴重地混淆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否定了文學作品的審美特性、因而也就否定了文學本身。在他看來、注重於藝術美的文學、都不過是『雕蟲小技』、根本沒有寫作的必要。六朝文人重視文學的審美特性、注意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界限、從文學觀念的發展上說是一大進步。李諤取消文學作為藝術的特點、把它和非文學的文章混同為一、從文學思想的發展上說、是一種嚴重的反動與倒退。第三、李諤從上述錯誤思想出發、也就不能正確區分重視藝術的形式技巧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形式主義傾向的不同、完全抹煞了六朝文學在藝術形式技巧方面的重大成就與不朽的貢獻。他從漢儒迂腐、保守的『言志彰教』、『質樸尚用』的觀點去看待六朝文學、把它說得一無是處、甚至認為政治的腐敗也是這種文風影響的結果、這就更加荒謬了。他說六朝文學是『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遂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他在這裡所批評的六朝文學之重緣情、重藝術、恰恰正是六朝文學發展中的優點和有價值的貢獻、所以真正顛倒是非黑白的、不是六朝的文人、而正是李諤自己。李諤這種儒家復古主義的文學思潮、在六朝時期也是存在着的、但不占主要地位。例如裴子野的雕蟲論就是李諤上書之先聲、但在當時沒有發生多少影響、蕭綱就曾嘲笑他說：『裴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到了隋代、這種文學思潮才借助於隋代在政治上對六朝的批判、而占據文壇的統治地位。它直接影響到隋末唐初的王通、並且對中唐以後的文學思想發展有較大關係。

王通（五八四—六一八）、字仲淹、據新舊唐書中王勃、王績傳的記載、他是『隋末大儒』。他現存的著作有中說、體例模倣論語、大約是他弟子所輯錄編成的。他死後、其門人私謚『文中子』、故其書又稱文中子。王通的文學思想是對李諤思想的進一步發揮。從文學觀念上說、他不是象六朝一樣逐步分辨文學與非文學文章之間區別、而是承襲先秦極為寬泛的廣義文學觀念、他所說的『文』大體上相當於『文化』的概念、從文章的角度看、則是包括了一切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著作、所以比李諤說的『文』的範圍還要廣、這樣就模糊和取消了文學特點。王通強調『文』必須『貫乎道』、

『濟乎義』（中說·天地篇）、合於『雅』而『及理』（中說·王道篇）、而詩歌也必須『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中說·天地篇）、和漢儒一樣、把文學當作經學的附庸、與李諤之強調『風教』、如出一轍。從這個標準出發、他對南朝的詩人從人品到創作、都給以了否定的評價。其中說：『事君篇說』：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按：吳筠當為吳均或王筠之誤、孔珪即孔稚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王通這裡對南朝許多著名詩人的貶斥、都是從儒家的倫理道德標準和『溫柔敦厚』的『詩教』觀點出發的。他所批評的這些南朝詩人中、確實也有一些人的創作中有不良的傾向、但是、即使是對這些人、王通也並沒有擊中要害。更主要的是、他這種簡單的論斷完全抹煞了象謝靈運、沈約、鮑照、謝朓、庾信等重要詩人對文學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對這種貢獻、我們無需贅述各種文學史上已有的分析、只從李白、杜甫詩中對他們的欽佩與贊揚即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白對謝靈運、謝朓、謝惠連、鮑照、江淹都十分崇拜、他曾說：

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

——送舍弟

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全陵城西樓月下吟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

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杜甫在他的詩中也屢屢對南朝詩人贊揚備至、他曾說：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白也詩無敵、飄然獨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春日憶李白

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解悶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戲為六絕句

由比可見、王通對這些南朝著名詩人的否定實在是非常不應該的。

至於王通所贊揚的顏延之、王儉、任昉三人、均擅長於非藝術文學之一般應用文章、而在詩歌方面或成就一般或無

所成就。鍾嶸在詩品中評顏延之云：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

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

顏延之的詩歌創作注重辭藻華艷、典故堆砌、而缺少「秀逸」的審美意象、故湯惠休說：「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鑣金。」（見鍾嶸詩品所引）所以他雖「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宋書·顏延之傳）、但藝術成就遠不如謝靈運、誠如鍾嶸所說、不過是「經綸文雅才」。至於南齊王儉、詩品中列在下品、說他「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也同樣是以寫作政論文之類出名、於詩歌則無所成就。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中曾說：「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由此可見其一般。梁代任昉、鍾嶸詩品中列為中品詩人。說他：「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沈任筆。」又說：「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適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可見、任昉也是以善寫非文學的一般文章著名的。故梁書·任昉傳也說：「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而且他們三人的文章都合乎儒家政教要求、而具有典雅的特點。

對六朝文學發展中在藝術的形式技巧格律等方面的重大貢獻、王通也視為「末流」而加以否定。中說：天地篇記載道：

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達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填篋、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李百藥是唐初著名的史學家、曾撰北齊書、其文學觀點和王通顯然不同。王通在上述引文中所表現的態度與觀點、對應瑒、劉楨等建安七子和沈約、謝靈運的詩歌創作、以及齊梁詩人對詩歌格律的貢獻、完全持否定意見、十分痛恨而置之不顧、這與李諤上書中所說「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是一致的。

王勃（六四九—六七六）、字子安，是王通的孫子。作為初唐四傑之一，王勃在詩歌創作上曾經為唐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的名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等都已初步體現了後來盛唐詩歌所具有的感情真摯、熱烈、風格自然、流暢的特點，誠如聞一多先生所說：『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唐詩雜論·四傑）但是正像許多文學家的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有明顯的矛盾一樣，王勃在文藝思想上承繼其祖父王通的觀點，是相當保守的。在平台秘略論·藝文中，他雖也肯定『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但實際所指和曹丕論論文中所說的含義不同，主要是說的一般政治倫理道德方面的應用文章，而對『緣情體物』的詩賦作品，則斥之為『雕蟲小技』。特別是在上吏部裴侍郎啓一文中對六朝文學曾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說：

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騫，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免周陳之禍。

王勃從儒家正統文學觀出發，把淫靡文風的淵源一直追溯到屈原和宋玉，這和梁代裴子野雕蟲論中的觀點是相同的。他把崇尚詞章、文采看作是導致國家動亂敗亡的根源，和李諤上書中所說『文筆日繁，其政遂亂』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其實，王勃在創作中並沒有完全擺脫齊梁文風的影響，同時也是吸收和繼承了齊梁文學的藝術成就的，在此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使秀麗與壯大相結合。例如他的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天長一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即是明證。王勃這種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上的矛盾，他對六朝文學的激烈否定，可能與他對當時文學創作狀況的不滿有關。楊炯王勃集序中曾說：『嘗以龍朔（六六一—六六三）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糝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時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業。』（括號內為引者所加）。但是，王勃對六朝文學的這種全盤否定的偏激之見，無論如何，對文學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唐代新文學的建設，是不利的。

從李諤到王通、王勃這一派的觀點，雖然對揭露齊梁文學的缺點，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可是由於他們對齊梁文學的

重要貢獻與功績一筆抹煞，又提倡復古，主張回到漢儒經學文藝觀的立場上去，這顯然只能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概括起來說，這一派在理論上的失誤，至少有以下三點：第一、他們以『言志彰教』來反對『緣情體物』，是違背文學本身特點與規律的，其結果只能是使文學喪失自己的獨立性，而成為儒家禮義的說教工具。第二、他們以『質木無文』來反對華美艷麗，否認文學形式與技巧的重要意義與作用，看不到也不懂得文學的審美特性。第三、他們違背了文學發展的基本事實，粗暴簡單地否定了屈原、三曹七子、陶謝、江鮑等一大批對文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著名詩人與作家，拒絕接受自楚辭以來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豐富藝術經驗。因此，他們所代表的文藝思潮，不是健康的進步的文藝思潮，而是文藝思想發展中一股陳腐的復古主義暗流。

三

反齊梁文風中以唐初的史學家為代表這一派觀點，與李諤、王通、王勃這一派很不相同。唐初修史風氣很盛，這正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探討建設繁榮昌盛的大唐帝國之新路。房玄齡（五七八—六四八）等編了晉書、李百藥（五六五—六四八）編了北齊書、令狐德棻（五八三—六六六）編了周書、姚思廉（五五七—六三七）編了梁書、陳書、魏徵等編了隋書、李延壽編了南史、北史。他們編著史書的過程中，必然要涉及到對南朝（包括整個六朝）文學的評價問題，因為文化建設也是大唐帝國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是輔助李世民的重要政治家，思想比較開明，具有遠見卓識。他們看問題比較全面，所以，雖然也批評六朝文風，但是極有分寸，而不過激。他們的基本思想是要兼取南北之長，而避其所短，主張文學作品既要有充實的社會內容，又應當有華美的文采。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屈宋之辭賦、建安之詩歌，都是那個時代文學的驕傲，是應當充分肯定的。而西晉之陸機、張華、左思、晉宋之交的陶淵明以及稍後的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也都是繼承了這個優秀傳統的。他們認為六朝文學之出現傾斜，發生偏差，主要是

在梁大同（五三五—五四六）以後，梁簡文帝蕭綱和梁元帝蕭繹提倡宮體，而徐陵、庾信等又大力加以發展。但是，他們對蕭氏兄弟、徐陵、庾信等也不簡單地全部否定，尤其對庾信在入北朝後的作品還給了很高的評價。現在，我們來分別研究他們的論述。

魏徵是唐初史學家，政治上威望最高，並對大唐帝國的建立起過重大歷史作用的著名人物。魏徵在隋書的經籍志和文學傳序等篇中對文學的歷史發展曾經作了全面的論述與評價。首先，他指出文學的功用是很大的：「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在強調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同時，又充分注意到了文學是暢達情志、風謠歌頌的特點，不象李諤等人那樣，把文學與非文學的文章完全等同起來，斥責緣情體物為末流、歪風。他十分重視文學緣情體物、表現人的心靈世界之特點。他在隋書經籍志中解釋「別集」之名時說：「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在集部總論中又說：「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這些精彩的論述，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六朝研究文學特點成就的繼承與發展。更為可貴的是，他對發憤著作的傳統給予了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文學傳序中說：「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它對唐代文學的健康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其次，魏徵在對文學歷史發展過程的論述中，也表現了和李諤、王通等人完全不同的觀點。第一，他對被王勃視為淫靡文風之源的屈原和宋玉以及極大地發展了「淫風」的枚乘、司馬相如等，都給了很高的肯定評價。在隋書經籍志中他說：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申杼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

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

其集部總論中又說：

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郢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艷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

由此可見、魏徵對楚辭與漢賦是十分讚賞的、並對楚辭與漢賦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足夠的估價。第二、魏徵對六朝文學發展的論述也與李諤等人完全不同、他對六朝文學的評價是很高的。《隋書經籍志的集部總論中他說：

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

這裡對玄言詩的批評採用了鍾嶸詩品序中的觀點、而對潘岳、陸機、謝靈運、顏延之、謝朓、沈約的評價、則都相當高、看來亦是吸收了鍾嶸詩品序中的見解。鍾嶸曾說：「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之為輔。」同時他顯然也參考了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對六朝文學的評價。他在《隋書文學傳論》中說：「自漢魏以來、迄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所謂「前哲」當指沈約。第三、他對齊梁文學的評論可以說是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的繼續。《文學傳序》中說：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縉彩郁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

這段論述中、魏徵在用詞方面也是與沈約接近的。他對齊梁時代的大部分作家也是充分肯定的、這就和李諤等人的觀點

相去甚遠了。特別應當指出的是，魏徵對六朝文人在藝術形式技巧方面的貢獻是給予了熱烈贊揚的，絲毫也沒有把它看作是『雕蟲小技』而加以貶斥。包括對聲律論的看法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他和鍾嶸也不一樣。

但是，魏徵對齊梁文學也有很尖銳的批評。他在文學傳序中說：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法。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魏徵把對齊梁文學的批評嚴格地限制在梁大同之後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為代表的宮體詩一類創作的範圍之內，是很有見地的，也是符合齊梁文學發展的實際的。當然，宮體詩一類的作品，雖有『淫放』、『輕險』之弊，在藝術上也並不是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別是對中國古代詠物詩的發展、描寫的細膩等，也都有過貢獻，然而，它總的發展方向是不健康的，走上邪道了。魏徵在隋書經籍志的集部總論中說：『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枉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閣之內。』可見，他對簡文帝的『清辭巧製』、『彫琢蔓藻』本身也並不否定，只是批評其內容格調之低下而已。

魏徵不僅對文學發展作了縱向的歷史評述，而且對文學如何正確地向前發展，也提出了極為重要的見解。他在文學傳序中說：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撥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魏徵這種文質兼備、南北融和的文學觀點，實際上成了唐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取南朝之華美清麗，而加以以北朝的意理氣質，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統一起來，也就是說，要在繼承南朝文學藝術成就的基礎上，吸取北朝文學重視作品的社會內容的長處，使內容和形式完美地統一，剛健清新，形象鮮明，從而創造出一種與唐代政治、經濟發展相適應

的，前所未有的新文學。

令狐德棻也是唐初的重要政治家。早在武德四年（六二二）他就建議修梁、陳、北齊、北周、隋史。他的周書王褒信傳論實際是一篇闡述文學的歷史發展狀況與如何創造唐代新文學的專論，可與魏徵隋書中的有關論述互相發明。在論述前代作家方面，他給予了屈原、宋玉、荀況、賈誼等以極高的評價，認為屈原「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玉繼他之後，「追逸轡而亞其跡」、荀況「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誼是「洛陽才子」、能「繼清景而備其暉」。他們都善於「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對於漢賦的作家他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司馬遷、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固）、傅（毅）、張（衡）、蔡（邕）為之雄。」到了魏晉時代，詩歌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曹（植）、王（粲）、陳（琳）、阮（瑀）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岳）、陸（機）、張（華）、左（思）、擅修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這樣的評價與李諤、王通之論，顯然是鮮明地對立的。令狐德棻認為從屈宋以來的這些作家都是孔子以後各朝的佼佼者，而從根本上說是與『孔門』一致的。可見，唐初的史學家雖然也講儒家政教，但他們理解的內容和範圍都很廣，更多是指現實的社會政治，而和漢儒和李諤、王通之把儒家政教看作為狹隘的復古主義教條，是很不相同的。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對北朝文學的評論。他在周書王褒信傳論中說：

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謙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泊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驂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

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昶、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糝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在這段論述中，令狐德棻既明確指出北朝文學不發達的狀況及其原因，說明「體物緣情」之所以「寂寥於世」，乃「時運然也」。同時，令狐德棻也充分肯定了北朝文學發展中具有剛健、俊逸風格、內容較為充實的作品。所謂「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的作品，正是就此而言的。他還指出北魏那些「聲實俱茂，詞義典正」之作，具有所謂「永嘉之遺烈」。應當特別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對北周蘇綽等人的評價，他認為蘇綽那種復古、保守的文學觀是很不可取的，說他「建言務存質朴，遂糝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可見，令狐德棻對魏晉以來的文學傳統是充分肯定的，對北朝文學忽視文學藝術的審美特性是很不滿意的。在對由南朝到北朝的著名作家王褒、庾信的評論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令狐德棻持論公正、全面的特點。他指出王褒、庾信是北朝最為出類拔萃的人物，「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但是也尖銳地批評了庾信在南朝時創作上的一些錯誤傾向，說他的文章，「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令狐德棻提出文學創作的正確途徑應當是「以氣為主，以文傳意。」這是和曹丕、陸機等的主張一致的。並且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這「調遠」、「旨深」的主張正是後來盛唐文學的重要特點。殷璠在論述唐詩發展時就曾指出：「景雲中，⁽¹⁾頗通遠調。」（河嶽英靈集叙）他還說文學創作要做到：「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這些可與魏徵所說：「文質斌斌，盡善盡美」、互相發明，也是後來唐詩發展所走的道路。

唐初其他的史學家也大都和魏徵、令狐德棻持相同的觀點。李百藥在北齊書文苑傳中也十分重視文詞之美。他

說：『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汲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乎？』為此他對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揚雄等作家也是充分肯定的。他說：『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駟鷲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他認為文學仍是人內心真實感情之流露、『文之所起、情發於中』、『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他對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及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都給以了高度的贊揚。只是對齊梁的宮體詩給予了批評、指出：『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沾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此外、姚思廉在梁書文學傳中也指出：『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強調文學是人心靈的真實表露、十分重視文學的抒情本質、顯然也是和李諤之斥責『緣情』相對立的。他對梁武帝愛好文學、重視文人、十分贊賞。他說：『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這也可見他對齊梁的許多重要詩人都是肯定的。

唐初史學家上述對文學歷史發展的評述及對新文學創作提出的要求、為唐代建國後文學的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與道路、同時也可以看出唐初史學家在思想上並不恪守儒家舊傳統、是重視吸取魏晉以來文學發展、尤其是藝術技巧方面的新成果、而富有開創精神的。因比、他們的文學思想之重要特點、是反對對齊梁文學的全盤否定、反對李諤、王通等人的復古、保守文學思想、所以是比較活潑、自由、而具有新的蓬勃生氣的文學思想。他們的這種積極、進取的文學思想、後來在陳子昂、李白、杜甫等的詩論中得到了繼承與發展、並在唐詩的繁榮發展過程中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註釋

(一) 見與湘東王書。

(二) 景雲為唐睿宗李旦的年號、公元七一〇至七一一。